

回鄉、探親與跨國聯繫： 香港錫克家庭 回訪印度的個案研究¹

卓嘉健

摘要

本文以香港錫克家庭回訪印度為例，探討回鄉探親這類活動，如何反映香港印度人與他們故鄉之間的跨國聯繫，以及他們如何運用這種聯繫去維持本身的宗教信仰及進行各項經濟活動。根據筆者自 2005 年在香港錫克教廟長期持續的田野調查，以及伴隨香港錫克家庭到印度旁遮普邦的探訪，本文考察香港錫克人回印探親對當地錫克家族跨國網路整合及本地日常活動的影響。以參與觀察所得的資料為基礎，本文分析香港錫克家庭回訪印度這一行為背後一系列的歷史及社會文化因素，並藉此展望在回鄉探親中展現的跨國聯繫，在全球疫情漸緩之後或會發生的轉變。

引言

海外移民及其後裔回鄉探親，在移民研究及旅遊研究中多有論及，因為移民回鄉探親不單止涉及人的流動，更重要的是背後所指涉的跨國經濟活動、思想交流與文化互動，對社會發展所帶來的重要影響。從經濟的角度看，海外移民回國旅遊及探親，除了代表他們對故鄉仍然保留情感的聯繫外，亦往往給祖國帶來資金、知識、思維方式、工業技術與商業管理上的衝擊，成為祖國發展經濟及推動社會

¹ 本文得以出版，首先十分感謝所有曾對筆者提供協助的錫克朋友。沒有他們的熱心幫忙，這項研究實在無法完成。文中所有錯漏之處，由筆者全力承擔。另外，感謝匿名評審提供的寶貴意見，亦特別鳴謝陳志明（Tan Chee-Beng）教授對本研究曾給予的指導。最後，謹以此文紀念曾在印度指導筆者的 Darshan Singh Tatla 教授（1947–2021）。

變遷的重要外力。以印度為例，根據印度外務事務局（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的統計，現時海外印度人（不論國籍，包括印裔）數目大約是六千四百萬人，可貢獻極為龐大的購買力，是印度政府一直積極希望吸納的經濟力量。為了吸引更多海外印度人回印投資及旅遊，印度政府推行了一連串措施，包括賦予海外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s, NRIs）及印裔人（Persons of Indian Origin, PIOs）一系列的經濟與出入境特權，例如有條件地容許他們在印度開設銀行或投資戶口、以及可以長期在印度居留，方便他們的資金流動。在一系列的經濟誘因以及個人家庭網絡的作用之下，很多海外印度人都樂於定期回訪印度。然而，他們在印度的具體行程、回訪活動與當地社區變化及經濟發展的關係、以及箇中所顯現的社會文化意義，卻鮮為學術界所探討。

筆者試圖以香港錫克人為研究對象，分析在他們回印度探訪的過程中，跨國網絡如何被維持及實踐。自 2005 年開始，筆者在香港的錫克教廟進行持續的參與觀察，展開對香港錫克人宗教生活及社會網絡的田野調查。根據多次到該廟做的調查及訪問，筆者發現很多香港錫克人會在一些長假期空檔舉家回印，探訪當地的親戚。對很多受訪的錫克人來說，定期回印探訪親友是重要的家庭活動，不論他們已移居香港多年、或者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Cheuk,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進行香港錫克家庭回印探親的研究，不單有助我們了解香港錫克人定期回印的目的，亦令我們更清楚認識海內外錫克人之間家族網絡的拓展、維持及功能。另外，自 2020 年初新型冠狀病毒開始在全球擴散時，至少有二千名居港的印度人，因為在春節期間回印，自此被迫滯留當地，其中以在旁遮普邦（Punjab）的香港錫克人為大多數（〈毛漢稱逾二千印度裔港人滯留印度〉；〈毛孟靜促派包機到印度旁遮普邦〉）。這亦間接反映很多香港錫克人對於定期返回印度探親，其實一直都極為重視。

本文以香港錫克家庭回訪印度為例，探討回鄉探親此類活動，如何反映移民與故鄉之間的跨國聯繫，以及他們

如何運用這種聯繫去維持本身的宗教信仰及進行各項經濟活動。除了在香港錫克教廟長期持續的田野調查外，筆者於 2007 年夏天伴隨一個香港錫克家庭到印度旁遮普邦（Punjab）探訪，考察海外錫克人回印探親對當地錫克家族整合的意義及影響。搜集資料的方法包括：參與觀察一個香港錫克家庭在回訪印度期間的活動，以及面對面的個案訪談。筆者跟隨的錫克家庭成員包括 G 君、G 君的太太及他們兩名年幼的孩子，共計四人。至於面對面、多次回訪的深入訪談對象，則包括了七位住在旁遮普邦、而家中有成員已移居海外的錫克人。本文以參與觀察所得的資料為基礎，並在之後多次回訪該家庭及其他個案，去分析香港錫克家庭回訪印度這一行為背後的一系列複雜的歷史及社會文化因素，並藉此展望跨國回鄉探親之類活動，在全球疫情漸緩之後或會發生的轉變。

在開始正文之前，筆者想強調一點：本文的重點，並非要在海外錫克移民的人類學及社會學研究上，嘗試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途徑（a new way of theorizing）。本文的分析套路，其實和眾多當代全球錫克移民研究的經典文獻（例如，見 Ballard and Ballard, “The Sikhs”；Dusenbery；Tatla；Jacobsen and Myrvold 編著）一樣，尤其關注其中親屬網路（family and kinship networks）及公共宗教活動所產生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²所以，本文並非要藉着香港錫克人回印探親的個案研究，去證明或推翻跨國社會關係（transnational social relations）與親屬及宗教網路，在較為宏觀理論層面上的辯證關係。本文更關注的，是利用筆者長久而持續的人類學式觀察，盡力去在地理過去 10 多年來香港及印度的社會變遷（social

2 這種分析視角，除了常見於海外印度及南亞移民研究（包括非錫克印度人的研究），例如，見 Banks 著 *Organising Jainism in India and England* (1994)，Marsden 著 *Trading Worlds: Afghan Merchants Across Modern Frontiers* (2016)，以及拙作 Cheuk 著 “Diasporic Convergence” (2022)，亦多見於當代海外華人研究，例如，見 Tan 編著 *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2007) 及項颺的文章〈跨國華人〉(2004)。更多關於移民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理論性討論，詳見 Vertovec 著 *Transnationalism* (2009)。

change) 對兩地錫克人深遠且微妙的影響。並以此說明，他們之間的頗為恆常維持的跨國社會關係，並不會單單因為原生的親屬關係及固有的宗教認同，而會變得一成不變。換而言之，本文嘗試提供一個社會變遷的視角，去理解這些跨國關係的維持（或斷裂）的日常複雜性及不可預見性。

錫克人移居海外及回鄉探親的背景

在古旁遮普語中，「錫克」(Sikh) 一字的本義是「學生」或「弟子」，後被引申為信奉及遵從錫克教 (Sikhism) 教義的信徒。錫克教由古魯那納克 (Guru Nanak) 在十五世紀末創立，主張一神、眾生平等、反對偶像崇拜與種姓制度 (caste system) (Mahmood 26-34; 張占順, 頁 35-45)。對錫克教的信徒而言，錫克教廟 (gurdwara) 具有重要的地位，因為它是供奉錫克教聖書《阿迪·格蘭特》(Adi Granth) 的地方，而錫克教中各項宗教儀式與節慶，例如婚禮、洗禮及葬禮，都必須環繞《阿迪·格蘭特》來進行。即使是已移居海外的錫克人，例如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及香港的錫克人，他們也都會自發組織起來，在自己現居的國家中建設錫克教廟，凝聚當地的錫克社群，及盡力維持錫克教中的各項宗教儀式。



圖 1：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 的密西沙加 (Mississauga)，一眾錫克人在 Dixie 錫克教廟內排隊，等候朝拜聖書《阿迪·格蘭特》。
筆者攝於 2008 年

自古魯那納克創立錫克教以來，動盪與遷徙一直伴隨著錫克人，亦成了理解錫克教發展史及錫克人移民史的關鍵詞。由於錫克人在印度居於少數，錫克教的發展以及錫克人的生活處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統治階層的勢力及其更替所影響。在蒙兀兒帝國 (Mughal Empire；公元 1526 至 1857 年) 統治印度次大陸期間，就發生了很多伊斯蘭教與錫克教的宗教衝突，迫使錫克人要拿起武器，以軍事化的策略來自保與抗衡 (Jeffrey 61-62)。在英治印度時期，大量住在旁遮普的錫克人被英國招聘到海外當兵，或者到其他英國殖民地當警察、懲教人員，或在其他政府部門工作。因此之故，很多錫克人在這段時間內移居到馬來亞、新加坡及香港等英國殖民地工作，並最終在這些地方落地生根，定居下來 (Cheuk, “China”)。其後，印度於 1947 年宣佈獨立，而同年巴基斯坦從印度分裂出來。印巴兩國邊界的勘定，正發生在大量錫克人定居的旁遮普地區，於是這就造成了人類史上歷時最短，規模最大的人

口遷徙 (Talbot and Thandi)。大量錫克人不得不舉家遷離伊斯蘭教徒佔主體的巴基斯坦，逃往印度境內重建家園。當時，很多經濟條件較好的錫克人，選擇離開印度，移民到其他亞洲及西方國家。也正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移民到其他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較理想的國家，成了很多印度錫克人追求的目標；隨著海外親屬網絡的拓展以及自身經濟條件的改善，很多錫克人選擇移居到英國、美國、加拿大及其他亞洲國家，在當地形成頗具規模的錫克社區。

隨著通訊科技的發展和航空交通的普及，許多海外錫克人不斷加強自身與國內親屬的聯系，甚至會定期返回印度進行探訪。雖然未有確實的統計數字，但是筆者根據自己在香港的長期的調查所得，發現大部份的香港錫克家庭，不論是富有的還是經濟條件較差的，都會盡力定期派出家庭成員回訪印度，多則一年一次，少則數年一次 (Cheuk,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筆者所追蹤觀察的 G 君家庭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每年夏天，在孩子放暑假期間，G 家都會舉家回訪印度兩個月。在他們回到印度的這兩個月中，這個香港錫克家庭花了大量時間去：(一) 探訪居住在不同地方的親屬及參加他們舉辦的婚禮；(二) 參加家族的宗教朝聖活動和聚會；(三) 處理個人財務和資產管理。而要進行以上三項活動，海外錫克家庭都不得不親身返回印度，以便親自處理各項事務及進行適當的監管及交涉，其中顯示了他們定時回印的原因及意義。

探親活動：以參與婚禮為例

如前文所述，探訪親戚是很多海外錫克人定期回印的主要活動之一。縱使很多錫克人在海外工作及成家立室，他們年長的父母及其他親人大部份仍然在旁遮普居住。因此，當海外錫克家庭回印時，大多數都會寄宿於直系親屬，例如父母或岳父母的家中。以筆者跟隨的香港錫克家庭為例，G 君一家四口回印時，就曾在父母及岳父母的家中分別住了一個月。除了探望雙方父母並寄宿岳父母家以外，在這兩個月期間，他們還會舉家駕車外出，積極探望其他親戚。有時候，他們甚至要驅車大半天，才可到達某親戚的家中。

從香港錫克家庭的觀點看，保持與親戚的緊密聯繫是必要的，除了情感的驅動，亦因為他們在印度的土地及房產，都須倚賴親戚們的幫忙管理。對於海外錫克人而言，定期回鄉與親戚見面，可以順道視察自己的物業，以確保那些不動資產能獲得妥善的管理。在印度錫克人的眼中，他們亦樂於看見越來越多海外親戚回訪家鄉；他們相信海外親屬返印頻繁，除了代表他們心繫故鄉外，亦表示了家族的經濟力量不斷壯大，象徵家族社會地位的提升。因此，印度錫克人舉辦婚禮時，邀請海外親戚返印參加，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筆者的田野訪談記錄及其他學者的調查（Mand），我們均發現，錫克人普遍認為：在他們舉辦的婚禮中，越多海外親屬的參與，就越能有效地向其他賓客展現自己家庭的顯赫社會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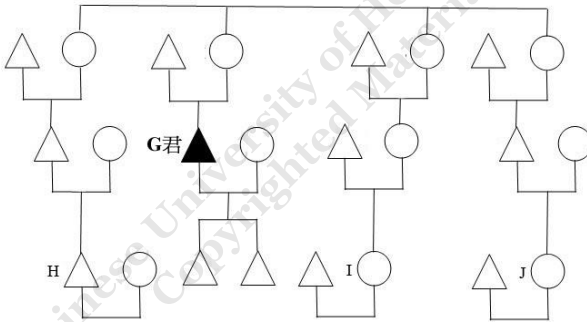


圖 2：G 君的親屬網絡

以 G 君家庭回印參加婚禮的經驗為例，我們看到，回鄉探親這類活動，對於海外錫克家庭及其在印度的親戚兩方而言，是互惠互利的。在 2007 年 1 月，G 君一家獲邀請回印，參加了三位姨表親主辦的婚禮（即是為了圖 2 中的 H、I 及 J 舉辦的婚禮）。一次回印參加多個婚禮，在很多香港錫克人眼中，是很平常的事情。正如 G 君所言，他的家族樂於協調，集中安排這些婚禮來方便海外的親戚，

以免他們為了參加不同親戚的婚禮而需要舟車勞頓，來去印度數次。G 君說：「如果這些婚禮不是全都在同一段時間舉行，我們根本不可能全部都出席。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會安排同一時段舉辦數個婚禮，例如在新年或聖誕假期時舉辦，讓海外的親朋可以抽空出席。」而作出這樣的安排，又的確使印度的錫克人可以邀請到最多的海外賓客回鄉參加婚禮。所以，他們亦樂於遷就海外親屬，協調數個家族中的婚禮在同一段時間舉行。因而，雖然聖誕節及復活節等西方節慶，在旁遮普都不一定是公眾假期，但是為了遷就海外賓客，極多印度的錫克人都會選擇在這些時間舉辦婚事，務求吸引最多的海外親朋參加。

家族與宗教聯繫的強化：以私人宗教聚會為例

在海外錫克人與其印度親屬的社會關係中，宗教生活可謂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根據錫克教的教義，錫克教徒必須要定期抽時間前往就近的錫克教廟參拜，最好是要每天一次，甚至乎每天數次（White 99）。但是，對於大多數海外錫克人而言，因為生活或工作繁忙，他們一星期內只可能到錫克教廟一次；一般打工一族放假的星期日，就成為了眾多海外錫克人前往錫克教廟進行禮拜的最佳時間。以香港的錫克教廟為例，每個星期日早上都有超過一千位錫克人聚集，人數遠多於其他日子。可是，當比較觀察香港與印度的錫克教廟時，筆者發現，一些印度錫克教廟的參拜人數遠比香港錫克教廟為少，而回印探親的海外錫克人，亦多數選擇不去居所附近的錫克教廟中參拜。然而，這並不代表他們回印後降低了對宗教的重視。事實上，從海外回印作探訪的錫克人，很多時候都會抽空探訪一些與錫克教起源及發展有緊密關係的錫克教聖地，例如位於阿姆利則（Amritsar）、在錫克人眼中佔有重要歷史及宗教地位的金廟（Golden Temple）。與很多回鄉探親的錫克家庭一樣，即使 G 君的居所距離阿姆利則甚遠，需要駕一整天車才可到達，很多時候他一家仍會在旅程期間抽空前往金廟朝聖。在香港，很多錫克人會在一些長假期時自發組織印度朝聖團，到印度各邦中的錫克教聖地遊覽。由此

可見，儘管朝聖之類的行程，跟他們在香港的宗教朝拜模式並不一樣，當香港錫克人回印探訪時，宗教活動仍是重要的部份。



圖3：一個錫克家族的成員正在參與一個私人宗教聚會。筆者在2007年攝於旁遮普邦的昌迪加爾（Chandigarh）

除了不定期的朝聖活動外，海外錫克人在旅程期間，亦會定期參加由親戚舉辦的私人宗教聚會。在旁遮普時，筆者也收到請帖，獲受訪者邀請去參加他們家族舉辦的私人宗教聚會。根據 G 君的太太所說，這種由家族舉辦的宗教聚會，在現時的旁遮普頗為流行。和開放給公眾的錫克教廟不同，私人宗教聚會只會開放予家族中的成員、相熟的朋友與收到請帖的賓客。這些私人宗教聚會多由家族中地位較顯赫及富有的成員，在自己寬敞的住宅或私人會所中主辦。筆者曾經參加過由 G 君家族舉辦的宗教聚會，其中發現參加者除了 G 君在印度的親屬外，亦包括 G 君一家在加拿大及美國的親友，總出席人數多達一百人。即使人數眾多，G 君一家似乎也能夠認出所有出席聚會的親朋，

並向筆者逐一介紹他們彼此之間的親屬關係。G 君的太太說：「這些家族宗教聚會在暑假時特別頻密，讓眾多在這段時間回印探訪的海外親朋，有一次難得聚首的機會。」從 G 君一家的角度看，他們在印度的逗留時間始終有限，根本不可能逐家逐戶上門拜訪每一位親戚。因此，他們樂於參加這些由其他家族成員舉辦的私人宗教聚會，除了讓他們可以在同一場合見到大部份的印度親戚外，亦令他們可以與一些從其他地方回印探親的海外錫克人保持見面的機會。通過這一類的活動，一方面可以讓 G 君一家保持他們信仰所要求的宗教參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他們對於大家族的認同，透過共同的宗教活動，保持與眾多海內外家族成員的聯繫。

資產管理與投資活動：以併購農地為例

在印度，旁遮普盛產小麥，一直以來都是國家的農業重鎮。雖然旁遮普只佔印度國土面積的 1.5%，但全國大約三分之二的農產品都來自旁遮普，使旁遮普素有「印度的糧倉」之美譽（Government of Punjab）。對於很多錫克人來說，農業除了是重要的生計外，亦是他們引以自豪的成就。因此，在旁遮普，農地的多寡普遍被認為是財富及身份地位的指標。很多在香港的錫克人，縱使已離開印度多年，但仍然保留在印度的農地產權，甚至匯錢回印度購買農地，計劃在將來把土地傳給自己的兒子，確保其在印度的祖業、家產及地位得以延續。

可是，為了防止農業用地出現兼併的問題，印度政府禁止海外的印度人在印度購買農地。換而言之，海外錫克人要在印度買農地，就必須透過中介，例如借用印度親人的身份去購買，方才可以為土地合法註冊。誠如一位香港錫克人所言：

要在印度買地？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一些印度的親人幫忙去買。在印度，買農地本身已經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需要預備很多不同的文件…既要到政府部門註冊，又要到警察局登記，十分花時

間。如果以海外印度人的身份去買地…根本不可能！如果可以找到相熟的親友代為購買的話，就可以省回很多根本不必要的工夫及時間。

因此，如果海外錫克人要在印度買農地，很多時候都會找一位相熟的親友代辦，然後委託他們代為管理。對於海外錫克人而言，定期回印探訪是必要的，因為這類探訪除了可以保持與親屬們之間的聯繫外，亦可視察那些由親屬代購的產業，以確保它們獲得妥善的管理。大多數情況下，海外錫克人都會將農務耕作所得收益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交給託管那些土地的親屬，以答謝他們幫忙購買及管理土地。事實上，由於長期居於印度之外，海外錫克人根本不可能直接管理那些土地，而必須要倚賴一些可靠的親戚來幫忙。正如一位香港錫克人告訴我：

我們找親戚去管理土地，其中無任何特別的地方。我們仍是地主，只是拿這些農地來放租，或者讓在印度的兄弟來幫忙管理。其實，用這樣的方法來管理土地一點也不複雜。我們大部份的土地都種一年兩季的小麥。收成時，親戚們會把小麥拿去批發市場出售，賣給那些印度教商人。我們收錢，把東西賣給別人。就是這麼簡單！

自綠色革命（1960年代末開始）以降，³印度政府為了保護農民利益，一直以固定協議價格收購農產品；在這優惠政策之下，印度農民可以不高於政府最低保障價（Minimum Support Price, MSP）出售農產品予長期合

3 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是印度在1960年代末開展的農業現代化運動，其中包括全面引入高產品種種子（high yielding varieties of seeds），以改革以往低效低產的傳統種植方式。綠色革命使印度在極短時間之內高速提升全國各地農地的產量。在綠色革命期間，農業大邦旁遮普總農產量的急速提升尤為顯著，為旁遮普農業及當地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關於綠色革命及旁遮普農業及社會發展的討論，例如，見Leaf著“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 Punjab Village, 1965–1978”（1983），Singh及Kolhi合著“The Green Revolution in Punjab, India”（2005）。

作的中間商，以賺取穩定的收入（Mallikarjunan）。在這樣的條件下，這位香港錫克人也沒有太大的動力去直接參與管理自己在印度的土地。但是，他依然會定期返回印度探訪，和親戚們討論這些土地的管理計劃，維持兩者在農地管理上的合作。這樣的協作模式，一方面令海外錫克人保留在印度土地的產權；另一方面，又可以確保土地得到有效發展，同時加強及深化他們與親屬之間的關係。

然而，這類一直都較為穩定的合作關係曾面臨迅速瓦解的危機。2020年9月，印度政府通過了三部新的農業法案，其中包括取消MSP這項補貼農民的政策，準備全面開放農貿市場；這項改革引起印度農民的強烈反彈，大量來自旁遮普的錫克農民跑到首都德里，參與長期持續的示威活動，表明絕不會接受政府的新農業政策（Mallikarjunan；Singh；Jodhka）。香港的錫克社群亦組織「沒有農民，沒有食物」（“No Farmers, No Food”）運動，去聲援遠在印度的示威者。在長達一年多的對峙中，政府及示威者雙方一直都僵持不下。印度政府終於在2021年11月屈服，宣佈撤回法案。然而，在這樣雙方曾經長期對立甚至衝突的政治格局下，海外錫克人（包括香港錫克人）、印度錫克人及印度政府之間的關係，長期難免仍然會矛盾重重。

結論

本文以香港錫克人為例，討論了香港錫克家庭定期回印探訪的社會文化意義，分析了他們定期回鄉探親的目的及作用。對於海內外錫克人而言，在回印探親之類的活動中，其中一項重要的目的不啻是要保持印度內外錫克人之間的親屬關係，但這並不是全部。正如文中對G君家庭的討論，定時回印為香港錫克人保持參與印度的各項活動提供了必須的條件，其中包括了家族地位的建構、宗教生活的維持以及投資置業的參與。要保持在印度的影響力，香港錫克人就需要與印度的親屬保持緊密的互動，使多方的情感及利益關係得以長期維持。換而言之，回鄉探親這類活動，在維持移民及其故鄉的跨國聯繫之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筆者通過在印度旁遮普的觀察以及與印度海內外錫克人的接觸，發現了香港錫克人回印的經濟活動，多數都是為自己的家人購置農地及蓋新房子，而鮮有在印度作大型的商業投資。儘管很多香港錫克人擁有充裕的財力用作海外投資，他們大都不願意把大量資金投放回印度，反而選擇在其他國家尋找商機，其中包括地理位置上接近香港的中國（Cheuk, “Capitalizing”）。為甚麼印度難以吸引香港錫克人歸來投資呢？根據一些香港錫克人的解釋，箇中的原因並非是印度缺乏經濟發展潛力，反而是因為他們難以在印度尋找可靠的生意合作伙伴。一位香港錫克商人就曾向筆者訴說在印度做生意被騙的經歷，令他不敢再到印度投資。他說：

我把所有的貨物都交給了印度的合作伙伴，但他從來未有向我付款…我相信他，他卻欺騙我…唉！自此之後，我再也不會回印度做生意了。反而在其他國家，只要做事謹慎，大家曾經有合作的經驗，受騙的機會還是很少的。

對於香港錫克人來說，在印度作大型的投資，由於其中涉及複雜的人事關係，例如難以在印度尋找可以委以信任的生意合作伙伴，都使他們卻步，不敢「感情用事」，冒險把所有的資金全都帶回印度。相較起來，投放小量資金為家人在印度購房子、買農地，海外錫克人其實只需要找幾位可靠的親戚幫忙，再加上自己定期回印監管，就可以確保那些資產能夠獲得妥善的管理及增值。由此而言，從香港錫克人的個案來看，海內外錫克人之間的跨國經濟聯繫，多數止於以家族為本位的小型投資活動，以避免在印度開展大型商業投資潛在的風險。

在疫症全球持續蔓延下，特別是疫情一度十分嚴重的印度，香港錫克人回鄉探親之類的活動曾經被迫長時間暫停。疫情暫緩之後，他們回鄉探親的規律亦沒有以前那樣穩定。整體而言，在可見的將來，香港錫克人與印度家鄉的聯繫難免相比以前疲弱。正如本文提出，親身回鄉探親有其特殊的意義及功能，讓香港錫克人有效並持續參與家

鄉的親屬、宗教及經濟活動之中。這些參與都難以由其他非物質空間性的社會聯繫（例如網上及電話聯繫）可以取代。另外，印度政府近年的農業政策改革，亦直接或間接影響了香港錫克人在當地的農業利益，長遠會使兩地之間錫克人的跨國聯繫變得更為脆弱。在此而言，印度政府本地的改革措施，或與其一直希望吸引海外印度人回印投資的願望背道而馳。

參考文獻

英文

- Ballard, Roger, and Catherine Ballard. "The Sikhs: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sian Settlement in Britain." *Between Two Cultures: 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ain*. Ed. James L Watson. London: Blackwell, 1977. 21–56. Print.
- Banks, Marcus. *Organising Jainism in India and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rint.
- Cheuk Ka-kin.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cal Life, and Identity: A Study of the Sikhs in Hong Kong." M.Phil.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Print.
- . "Capitalizing on Identity and Mobility: Sikh Mercantile Activity Across the Hong Kong-China Border." *Sikh Diaspora: Theory, Agency, and Experience*. Ed. Michael Hawley. Leiden: Brill, 2013. 217–29. Print.
- .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Brill's Encyclopedia of Sikhism*. Ed. Knut A. Jacobsen, Gurinder S. Mann, Eleanor Nesbitt, and Kristina Myrvold. Leiden: Brill, 2017. 473–79. Print.
- . "Diasporic Convergence, Sustained Transience and Indifferent Survival: Indian Traders in China."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33 (2022): 279–94. Print.

- Dusenbery, Verne A. *Sikhs at Large: Relig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rint.
- Government of Punjab. "Know Punjab." *Government of Punjab*. 2021. Web. 21 March 2021. <https://punjab.gov.in/know-punjab/>
-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Diaspora Engagement." 2021. Web. 13 March 2021. <https://www.mea.gov.in/diaspora-engagement.htm>
- Jacobsen, Knut A., and Kristina Myrvold, eds. *Sikhs Across Borders: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of European Sikh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2. Print.
- Jeffrey, Robin. "Grappling with History: Sikh Politicians and the Past." *Pacific Affairs* 60 (1987): 59–72. Print.
- Jodhka, Surinder S. "Why are the Farmers of Punjab Protesting?"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8 (2021): 1356–70. Print.
- Leaf, Murray J.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 Punjab Village, 1965–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1.2 (1983): 227–70. Print.
- Mahmood, Cynthia Keppley. *Fighting for Faith and Nation: Dialogues with Sikh Militan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1996. Print.
- Mand, Kanwal. "Place, Gender, and Power in Transnational Sikh Marriages." *Global Networks* 2 (2002): 233–48. Print.
- Marsden, Magnus. *Trading Worlds: Afghan Merchants Across Modern Frontiers*. London: Hurst, 2016. Print.
- Singh, Nirvikar, and D. S. Kohli.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Punjab, India: 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unjab Studies* 12 (2005): 285–306. Print.
- Singh, Pritam. "Glaring Flaws in Farm Laws." *The Tribune*, 9 December 2020: 6. Print.
- Talbot, Ian and Shinder Thandi, eds. *People on the Move: Punjabi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Mig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rint.
- Tan Chee-Beng, ed. *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2007. Print.

- Tatla, Darshan Singh. *The Sikh Diaspora: The Search for Statehood*, London: Routledge, 2005. Print.
- Vertovec, Steven. *Trans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9. Print.
- White, Barbara-Sue. *Turbans and Traders: Hong Kong's Indian Commun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rint.

中文

- Mallikarjunan, Prabhu。〈印度農民抗議現場：莫迪急推新改革，誰收割利益，誰被收割？〉。《端傳媒》，2020年12月16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216-international-india-farmer-protest/>
- 張占順。《錫克教與錫克群體的變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 〈毛漢稱逾二千印度裔港人滯留印度 冀當局提出協助方案〉。《香港電台》，2020年4月24日。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22450-20200424.htm>。
- 〈毛孟靜促派包機到印度旁遮普邦接載滯留港人〉。《香港電台》，2020年4月24日。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22580-20200424.htm>。
- 項颯。〈跨國華人〉。《讀書》2004年05期：頁3-12。